

“新芽沙龙”第34期

国际教育合作：中国实践与外国经验

2021年6月17日

全球化进程推动了教育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蓬勃发展。即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教育合作依然方兴未艾。在新时代，我国如何更好地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去”？面对疫情后的种种挑战，我们又怎能从外国实践中获取怎样的合作经验？本期新芽沙龙以“国际教育合作：中国实践与外国经验”为主题，邀请不同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就以上问题展开跨学科的研讨。

本期沙龙由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马万华担任主办人，并邀请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蒋凯，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研究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进杰担任评议嘉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涛利主持沙龙。

首先发言的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颀**，他的发言题目是《合法与有效的平衡——中外合作办学学院制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他表示，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高等教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新的生长点，其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马来西亚和中东地区多是国际分校，而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中外合作办学。一般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有三种办学类别，分别是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张颀聚焦学院场域，以跨国高等教育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试图对外方高校的办学理念、组织模式、教育体系与中方相互交融、融合，进而形成特定的中外合作办学的组织模式的过程做一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分为学院制度环境、学院组织形态、运行机制特点和组织解释机制四个方面。

在学院面临的制度环境方面，张颀认为，中外制度环境在中外合作办学这样一种组织模式中的表现各有不同。在制度目标上，中方的目标较为多样，主要是为了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满足学生需求，促进高等教育改革，而外方的目标主要是扩大教育市场；在制度手段上，中方往往会表现出更程度的介入性和规制性，而外方则更多强调办学流程的严密性，制度效率相对更强。

在学院组织形态方面，张颀从管理架构、师资队伍和课程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管理架构上，中外合作办学学院一般呈现出“联合管理委员会——院级管理团队——具体管理部门”三级管理架构。联合管理委员会是中外双方校级领导共同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院级管理团队的中方部分和高校的普通学院非常类似，特殊之处在于外方一般会派驻其副院长担任常务副院长，且双方会成立院级的沟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师生联络委员会等机构；具体的管理部门在整体上和普通学院的管理部门类似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独特的学生国际发展办公室（或学生海外发展办公室），其主要目的是为学生出国留学提供便利。在管理主体

上，中外两个管理主体同时对学院产生影响，且学院要承接中外两套管理制度。在师资队伍上，中外合作办学学院只有管理团队，没有自己的师资队伍，非常依赖中方的职能部门、合作专业的母体学院和中方高校的母体学院。此外，中外合作办学学院的外方教师往往不是外方学校的核心教学力量，且授课教师往往是“飞行教学”，只在中国停留半个月到一个月。在课程体系上，学院的课程体系以外方课程为主，但大部分课程由中方教师教授。调查发现，尽管全外文授课是中外合作办学学院的教学特点，但受教师和学生的外语水平限制，在实际教学中很难做到。

在运行机制方面，张颀总结了中外合作办学学院的四个特点：1. 遵守中外双方制度框架，除了通过中国教育部的评估外，还非常重视英国 QA 质量认证、英国工程技术学会认证等外部认证；2. 委员会不投票，双方保持沟通和互信；3. 中外有别，双方分管各自擅长的活动；4. 南橘北枳，整体采用外方大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但制度运行更多采取形式化执行的方法，制度履行效果不佳。

最后，张颀尝试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对中外合作办学学院组织模式的形成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解释制度环境与组织间关系非常重要的桥梁。研究发现，中外合作办学深受制度环境影响和规范，其学院的组织架构既要满足中方对办学管理主导权的需求，又要满足外方参与教育管理和颁发学位的需求。张颀认为，合法性机制对于此类学院运行的解释力有所欠缺，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制度环境本身存在矛盾，另一方面在于中外合作办学学院本身

也面临着营利性和公益性、办学合同性和教育长远性以及本土化和国际化的矛盾。这样一来，合法性所造就的组织架构不足以支持中外合作办学学院的运转，由此在应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组织矛盾的过程中就凸显了效率机制的作用。

第二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陈昊志**，他的发言题目是《俄罗斯高校建设海外分校的经验与启示——基于中亚五国的研究》。王陈昊志表示，文献分析结果表明：国内外学术界对俄罗斯高校海外分校的研究非常稀少，几乎没有针对这一主题发表的中文和俄文文献，唯一一篇聚焦该主题的英文文章由牛津大学教育系学者发表在 2021 年的 *Post-Soviet Affairs* 上，是一项较为宏观的政策研究，对俄罗斯高校海外分校的具体情况涉及不多，其使用的数据也大多更新于 2018 年前，因此仍然有必要对俄罗斯高校的海外分校进行深入研究，并及时修正有关信息。

在研究范式上，王陈昊志的研究采用了跨国经营管理领域的全球整合（Global Integration）-当地响应（Local Responsiveness）范式。该范式认为，跨国公司向海外拓展时必然要面对双重环境压力：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提供同样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得尽可能高的效率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国政府规制、竞争环境和市场需求等特点和要求各有不同，因此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需要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对于俄罗斯高校而言，其面临的全球整合任务是在中亚五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尽可能提供同样的、高水平的高等教育服务，以推广本高校或俄罗斯的教育标准，形成俄罗斯高等教育的声誉优势并从中获

利。但即便是在中亚地区，各国对外国教育机构也有着不同的政策，各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环境和人才需求也各有不同，因此需要合理安排高校、专业和培养模式，及时做出调整以实现“当地响应”。

在核心概念的界定上，王陈昊志的研究采用了美国比较高等教育专家阿特巴赫对“海外分校”的定义，不考虑联合学位、合作办学、为举办方大学学生提供服务的海外校园、学位特许经营和其他国际计划，原因是该定义所界定的“海外分校”更接近于俄语的 филиал 概念。在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高等教育语境下， филиал 指的就是高校在一国境内或境外的分校。

考虑到现有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问题，王陈昊志通过高校章程、高校官网、政府信息公开系统等多渠道对海外分校的认证和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截至 2021 年 6 月，俄罗斯高校在中亚五国开办海外分校共 22 所，其中哈萨克斯坦 4 所，乌兹别克斯坦 10 所，塔吉克斯坦 3 所，吉尔吉斯斯坦 5 所。位于土库曼斯坦的俄罗斯古布金石油天然气大学阿什哈巴德分校于 2012 年停办后，该国再无俄罗斯高校的分校。在运营时间方面，有 2 所分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苏联时期，一半以上的分校已持续运行 10 年以上，属于较为成熟的分校。在运营主体方面，大多数分校由俄罗斯公立高校设立。在培养层次方面，大部分分校以培养本科生为主，少数分校提供硕士层级的教育项目。结合已公布的数据，即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尚无一所分校出现巨额亏损的情况，少部分高校甚至能够实现经费结余。此外，位于中亚五

国的各分校均能顺利完成招生计划，其中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塔什干分校部分专业的报录比甚至接近7：1。

接下来，王陈昊志从地区、国别和高校三个层面对中亚地区俄罗斯高校海外分校平衡“全球整合”和“当地响应”双重环境压力的背景和做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地区层面，俄罗斯在各方面同中亚地区联系紧密，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较强，并同中亚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供需关系，从而有利于减轻其海外分校的环境压力。在国别层面，中亚地区俄罗斯高校海外分校的设立和运行基本遵循“政府推动，两国共建”模式，分校的开设由政府间协议确定，有时甚至有国家元首的参与，因此落实效率高，并有利于解决海外分校开设和运营过程中的资金和设施问题，增强海外分校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此外，中亚地区的俄罗斯高校海外分校往往与政府间重大项目接轨，同当地企业展开合作，能够通过多种形式迎合所在国各方面的需求，因此能够融入当地社会，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在高校层面，王陈昊志指出，俄罗斯高校在其国内就有数量较多的分校，分校运营经验相对丰富。此外，各分校能够明确自身定位，主抓人才培养，保障学生就业水平，并主动接受当地管理，及时对内部管理机构和培养方案进行调整，因此能够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王陈昊志最后表示，对中亚地区俄罗斯高校海外分校的研究表明，海外分校的开设和运行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多方协作，秉持渐进发展的原则，而且要把握所在国社会需求，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增强分校自身的竞争力和生

存能力。

张颀和王陈昊志的发言结束后，两位评议人分别对两位同学的发言进行了点评。**蒋凯**教授指出，在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张颀同学的选题很有现实意义，其研究的特点在于深入现场获取了翔实可靠的一手资料和数据，且没有局限于描述性研究，能够结合有关理论进行分析论证，提出了新颖而深刻的观点。王陈昊志同学的研究视角独特，能够结合典型案例对中亚地区俄罗斯高校海外分校的发展与运行情况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希望能够补充更多数据，使研究成果更为详实。**王进杰**主任建议同学们使用定性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以使数据的整合和呈现更加具体。

在沙龙下半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助理**邹雨君**首先进行发言，题目是《非洲教育、发展与国际合作——乌干达穆塞韦尼政府教育政策演变研究》，分为选题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三个部分。

在选题背景部分，邹雨君从现实背景和历史背景两个角度进行了介绍。她指出，非洲的青年膨胀带现象非常突出，青年群体失业率普遍较高。贫穷、不安定、易煽动似乎成为了非洲青年的标签。研究认为，青年失业的原因在于非洲的教育未能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不能将年轻人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人力资源。由于既有研究非常强调非洲教育的对外依赖性，因此有必要对非洲教育发展的国际影响进行研究。邹雨君将非洲独立后的教育发展分为五个主要阶段：上世纪 60 年代，非洲国家的独立带来了各层次本土劳动力需

求的快速上升，使非洲化成为该时期的教育目标，即由本土非洲人填充白人、亚洲人等的离开而造成的职位空缺，中学教育是该时期的教育重点；上世纪 70 年代，非洲国家团结争取经济文化独立，强调教育的“相关性”，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组织机构在该时期影响着非洲国家的教育；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非洲自主发展进程被破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非洲国家纷纷开始实施结构调整计划，削减社会领域开支，以社会回报过低为由抛弃高等教育，进而转向基础教育，使非洲高等教育受到重创；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5 年前后，由于硬件和软件条件限制，非洲基础教育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基础教育质量的迅速下降，非洲国家开始对基础教育进行调整，再加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始打出“知识经济”的旗号，非洲的高等教育开始复苏；2005 年后，非洲教育以 STEM、ICT 和职业教育培训为主要关注点，青年发展困境对地区发展与安全造成了不小的威胁，青年就业逐步成为国际议程。

在研究问题部分，邹雨君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她表示，在她的研究中，“国际合作”主要指国际发展合作，“教育”主要指教育政策，而“国家发展规划”则通常体现在特定的政策文件中，是一国政府部门颁布的涵盖国家一定时期内发展目标和发展优先序等内容的指导性文件，承载着一个国家对于国家责任和发展的认知，是多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合集。邹雨君认为，国际发展合作通过塑造国家对整体发展的认知，塑造了国家对教育的认知，进而影响了一国教育政策的制定。换言之，国际发展合作改变了国家发展与教育

政策之间的关系。基于以上分析与界定，邹雨君提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即“国际合作如何影响非洲国家的国家发展规划，进而影响其教育发展？”

在研究设计部分，邹雨君选择乌干达作为其国别案例进行研究，其原因在于乌干达穆塞韦尼政府具备代表性、特殊性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在特殊性方面，乌干达是非洲全面推行小学教育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全面实施中学教育的非洲国家，更是第一个将中文纳入部分公立高中必修课的国家；在可行性方面，乌干达现有第一所在非中资私立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并运行有鲁班工坊、孔子学院、职教联盟等合作项目，能够为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在具体的案例分析框架上，邹雨君将穆塞韦尼政府自 1986 年至今的教育政策分为了三个阶段。她指出，在不同阶段，受不同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乌干达的教育与国家发展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教育先是成为财政改革的牺牲品，再是为国家减贫服务，最后是为青年就业议程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国际影响对乌干达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非常巨大，但其得以实现都是因为契合了该时期穆塞韦尼政府的政治需求，或是契合了乌干达的政治社会结构。

最后，邹雨君表示，在上述分析框架外，她将对乌干达技能发展项目和艾伯丁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这两个乌干达国内现有的具体国际职业培训项目进行分析，原因在于这两个项目重点均为职业教育培训，是乌干达目前力推的两个主要教育项目，且由国际机构、乌干达政府和实施方共同构成主要的三个方面，与本研究高度相关，值得深入分析。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杨体荣**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对东南亚教育援助政策实施的困境与进路——基于场域理论的历史比较分析》，主要分为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问题、研究思路与方法和分析内容四个部分。

杨体荣首先指出，研究中国对东南亚教育援助政策的实施主要有两个背景：一方面，《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等文件表明，教育援助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在此时探讨教育援助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许多东南亚国家需要外部教育援助来维持其教育系统的运作，推动其教育发展。这样一来，考虑到我国学术界对东南亚的教育援助研究较少，在此时对教育援助发展进行研究，有利于弥补相关领域的不足，丰富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

杨体荣进一步指出，由于教育援助政策涉及教育、经济、国际关系多个领域，内外部张力复杂，因此可以使用场域理论，从力量变化角度分析政策实施中的困境。基于此前文献分析的结果，他拟定了以下两个研究问题：中国对东南亚的教育援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基于我国最新的教育对外开放规划和复杂多边的国际形势，中国如何优化东南亚教育援助政策的实施？

在“教育援助”和“政策”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界定上，杨体荣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将“教育援助”定义为“援助方以促进教育发展为主要目标，向受援方提供资源及其实践”，并参考

公共政策领域对于“政策”的界定，将其研究的政策界定为“政府或其他公共空间的组织和个人所选择的行动和准则”，以将对教育援助政策的讨论由政府扩展至学校、基金会、企业等其它利益相关方。

杨体荣认为，由于教育援助政策涉及多个领域，因此在其实施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跨场效应，即教育援助政策的实施受到其他场域的影响。这样以来，还必须从跨场域效应角度分析教育援助政策的实施困境。

在研究思路与方法方面，杨体荣指出，对于如何研究教育政策实施的困境，现有研究有两种主要的思路：一是从教育政策实施的过程出发，从实践中寻找困境；二是从理论出发，以构建的理论框架分析政策实施的困境。本研究将采取第二种思路，基于场域理论对力量变化的分析和跨场效应做出的分类，去分析教育援助政策实施中存在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杨体荣的研究准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因素分析法。国内学界对东南亚的研究相对较少，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难以赴东南亚地区获取一手资料，因此文献研究法是本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而因素分析法则主要用来分析导致困境以及困境变化发展的具体要素，或促成困境变化发展的力量。

最后，杨体荣从以下四个维度介绍了其计划的分析内容：

1. 政策实施主体：将主要调查是否存在政策实施主体不明，与教育行政部门联系薄弱的问题；
2. 政策实施内容：将主要调查是否存在政策稳定性不足，容易受到跨场效应干扰的问题；
3. 政策实施形式：将主要调查是否存在政策实施形

式单一，缺乏对目标群体的调查和分析的问题；4. 政策体系：将主要调查是否存在政策体系尚未完善，实施过程缺乏合力的问题。

邹雨君和杨体荣的发言结束后，两位评议人分别进行了点评。**王进杰**主任指出，邹雨君的研究思路清晰，能够清晰展示对研究问题的界定、研究背景的分析和对研究意义的介绍，而且在研究角度上加入了国际组织和第三方的经验，但缺少了对研究方法的阐述，需要具体说明搜集和分析数据的途径。**蒋凯**教授认为，邹雨君同学的研究选题新颖，其实际上更多关注的是教育政策如何回应国际教育援助以及国际教育援助下的乌干达教育应对，可以参考约瑟夫·奈等学者的理论以实现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关于杨体荣博士的研究，他建议进一步考查中国对东南亚教育援助的类型、发展历程以及经费来源等问题。

针对王进杰主任的点评，邹雨君表示，她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个：首先，在阶段划分上，她使用了过程追踪分析方法，希望体现不同阶段的对比，并追踪较为关键的节点；其次，她准备对中方人员、国际组织人员、乌干达教育领域官员、乌干达受培训人员等进行大量半结构化访谈，以从非洲国家视角看待国际各方，并对中国与乌干达的差异化合作与其它各方同乌干达的合作进行横向对比；最后，她将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来自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一手和二手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并关注乌干达本土媒体的教育板块以获取最新信息。

本期沙龙主办人马万华教授指出，在非洲高等教育的发

展过程中，外部资源非常丰富，而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外部各方均有自己的目标，如世界银行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源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美国基于其自身国家利益的倡导。这样一来，整合外部援助、保持国家发展的独立性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她建议，在对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研究时，除了关注非洲高等教育的对外依附性和人才流失问题以外，还应当抓住主线，或重点研究多元化经费来源对非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或重点关注乌干达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国家意识的体现。马万华教授同时强调，在教育研究过程中应当注意区分“援助”(aid)和“投资”(investment)，不能将一些国家或组织在教育领域的“投资”视为“援助”。

“新芽沙龙”第 35 期

土耳其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21 年 10 月 22 日

中国与土耳其建交 50 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于 10 月 22 日举办“土耳其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博士生学术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的十余名博士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相聚，共话国内外土耳其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积淀，展望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趋势、新范式、新成果，围绕学术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咎涛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发展迅速，研究人员的语言和学术水平逐步提高，研究领域包括了历史、语言、经济、国际关系、政治、宗教、社会等多方向。特别是一批有志于土耳其研究的中国青年学子，正在国内外高等学府求学深造，未来将成为我国土耳其研究的生力军，肩负起在国际上提高相关研究质量、水平和声望的重任。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致力于搭建博士生学术交流的平台，帮助青年学子建立学缘、互相了解彼此志向和研究兴趣，为年轻一代学子的成长提供助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董雨和历史学系博士生马丹、吴奇俊、丁雨婷分别主持会议。

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博士研究生陈功以《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题首先发言。陈功认为，2000年是学术界对一战中奥斯曼帝国研究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相关研究作品不多，主要是利用西文材料写作的对战争过程的总体性介绍，专题研究不多。

2000年，埃里克森出版以奥斯曼文军事档案为基础而写成的 *Ordered to Die* 一书，具有转折意义，此后，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用奥斯曼文材料写作的作品，其中既有对战争的总体性介绍，也有专题研究。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特别是在大叙利亚地方史研究、妇女史研究等方面，但目前学术界仍然需要对战时军事史、经济史，以及东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方史的研究，并需要扩展所使用的史料的范围，比如利用俄语和波斯语材料，或使用土耳其红新月会近年来公开的史料。总的来说，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一个拥有光明前途的研究领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乌呢尔以《英国瓜分奥斯曼帝国企图的伊始——〈德·邦森报告书〉及其影响》为题发言。乌呢尔首先介绍了《德·邦森报告书》的历史背景：近代东方问题出现后，欧洲列强对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展开了激烈的战略竞争和利益争夺。英国与俄国在土耳其海峡、君士坦丁堡以及奥斯曼属地等方面的争夺最为激烈。一战前，英国对东方问题的基本态度是尽力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英国鼓励奥斯曼帝国进行一定的内部经济与行政改革，并且必要时扩大对其外交和军事的支持，以维护欧陆地区的总体

均势。然而，一战爆发后，英国开始改变维护奥斯曼帝国存在的传统政策，转而积极参与瓜分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地的利益分配。

1915年4月，为厘清战争获胜后英国在土耳其亚洲地区的战略目标及策略，英国内阁任命外交部副大臣德·邦森组建跨部会委员会来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6月，委员会发布《德·邦森报告书》，这一文件成为内阁层面对土耳其政策转变的起点。自此，英国配合外交层面与地方层面，分别积极同协约国盟国和阿拉伯地方势力合作参与瓜分并侵占奥斯曼领土。《德·邦森报告书》是英国在战争期间第一次针对奥斯曼亚洲领土的政策建议，报告中的政策目标与建议构成了英国未来处理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主要考量要素，为一战后英国中东殖民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后奥斯曼帝国时期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东方问题到中东问题，在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演变中，《德·邦森报告书》对分析东方问题最后阶段英土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其内容与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梁莹莹的报告题为《土耳其现代民粹主义的形成（1908-1960）》。国内外学界对民粹主义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它在不同地区、国家甚至同地区、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内都有着不同的发展形式、内容和影响，但普遍的民粹主义一般指向选票政治，以及平民与精英的对立。

此特点是否适用于土耳其？以上世纪50年代为例，1950年大选的投票门槛降低了，暗箱操作的选票机制也向着更加

公开和透明的方向发展。由此，土耳其得以进行第一次真正代表民意的民主大选，选票政治开启。普遍民意在土耳其第一次成为能够左右政治方向的重要力量。

然而，在一个 80%以上国民都是农民的国家，普遍民意发挥主导作用需要少数引导者。民主党作为土耳其现代民粹主义的促成者和实践者，其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十年执政期间连续赢得四次大选。民粹主义并非在 1950 年才出现在土耳其，早在 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时期帝国的精英们便为了救亡图存已将其引入。但后世学者在观察 1908 年和 1960 年的民粹主义时，两者已大不相同了。通过追溯 1908-1960 年间民粹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历程，可知民粹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普遍的民粹主义特点也并不完全适用于土耳其。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赵馨宇关注土耳其的语言改革问题，报告题为《帝国意象与共和梦想——奥斯曼土耳其语改革之争》。

语言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在实现人的社会化和塑造民族认同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语言改革也因此成为众多国家在微观层面灌输民族意识的重要政治实践。赵馨宇的研究梳理了从奥斯曼帝国末期推行阿拉伯字母拉丁化到 2014 年奥斯曼语正式回归中学课表的语言改革过程，介绍了几次相应的学术论辩及相关机构的发展史，将语言改革政策与“新奥斯曼主义”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其他表现相对比，探讨了奥斯曼因素在当代土耳其文化政策和认同政治中的作用。

她指出，关于奥斯曼土耳其语改革的讨论已经超出了语

言政策的范围，变成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宗教信仰和历史特质的争论，而一个人对此的看法反映了他的政治观以及他对民族身份的定义。土耳其民族身份究竟是随着1923年共和国的建立而诞生的一种不受伊斯兰-奥斯曼色彩影响的全新身份，还是应该包括这些长久以来存在于其历史中的元素？从凯末尔时代开始，土耳其不同政党对奥斯曼身份的利用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而保持对这些政治动态的关注对把握土耳其的历史书写是十分必要的。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张楠以《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宗教教育研究回顾（1923年-1950年）》为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宗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一点在教育中也有所体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教育以宗教教育为主，然而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对宗教教育进行了较为激进的改革。1924年《教育统一法》颁布，规定了共和国境内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统一归国家教育部管理，宗教不再过问教育；教育部负责开设高等教育神学院和伊玛目哈提普中学。这部法律对土耳其的教育系统尤其是宗教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世俗教育的基调，奠定了教育中央集权的法律基础。

从1923年到1950年，土耳其的宗教教育经历了严重的打击、剧烈的变化，在讨论与批评中摸索前进。最初土耳其试图寻求一种完全脱离宗教的世俗道德教育，然而经过20多年的探索，土耳其并没有找到一种可以替代宗教的世俗道德教育模式。他们意识到抛弃传统一味地追求世俗道德教育，

在一个大多数人口都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是不现实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到多党制时期,宗教教育培训逐渐回归、焕发生机。这之后虽然也经历了一些干扰,但总体上还是处于温和的复兴当中。虽然今天土耳其国内的一些人仍然赞成完全取消宗教教育课程,但从土耳其宗教教育整体发展情况中不难发现,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吴奇俊以《土耳其阿拉维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对阿拉维派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回顾。

阿拉维派是当前土耳其共和国仅次于逊尼派的第二大宗教派别。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对阿拉维派进行研究的是西方传教士团体。传教士接触克孜尔巴什(kızılbaş)主要是出于宗教目的,因此集中于论证克孜尔巴什和基督教的渊源。可以说,西方传教士开启了学术界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这个独特群体的研究。阿卜杜拉·哈密德二世在位时期,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zm)成为帝国的一项国策。政府提出所谓“信仰矫正”政策(inançların düzeltilmesi),旨在纠正那些偏离了正确信仰轨道的穆斯林,阿拉维派就是重点目标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层面出现对于阿拉维派的研究,主要是阿拉维派聚居地政府当局提交的一些考察报告。青年土耳其党执掌奥斯曼帝国政权后,以巴哈·赛义德为代表一批学者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阿拉维派进行考察。赛义德强调研究背后的目的是防止阿拉维派与那些非穆斯林民族之间可能的合作,提出阿拉维派是保留下来的最传统、最纯粹的土

土耳其人的观点。共和国成立后官方一直回避国内人口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差异性，受到这种大环境的局限，学术界这一时期涉及阿拉维派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有着较为明显的“倾向性”。

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于阿拉维的研究禁忌被逐渐突破，相关学术成果开始大量涌现。这类研究以逊尼派学者为主，一个明显特点是强调土耳其社会的统一和团结，忽视阿拉维和逊尼派社区之间的差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于阿拉维派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主题不断细化，主要聚焦于阿拉维派的历史演变、宗教思想、与国家关系、阿拉维复兴、移民等几大主题。然而还是存在偏重“两头”的状况，对于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这段时间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朱珈熠以《土耳其社会主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对左翼思想在土耳其的产生、发展、演变进行梳理。

社会主义思潮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力量，深刻影响了20世纪60、70年代的青年人。社会主义思潮对土耳其政党和政治制度、女性与性别问题、少数族裔、社会运动等有着深刻影响，研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国内的对于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左派）相关研究主要来源有三个：一是北大、上大、陕西师大、上外、西北大学等高校的土耳其（或中东）研究中心；二是有土耳其研究传统的高校历史系，如辽宁大学和河南科技学院；三是各单位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是做国际共运的相关研究。

研究人员来源比较多元，也有比较详实的学术梳理，缺点是发展较晚，没有专门的研究学者，使用一手材料进行深度的研究，整体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

相比之下，国外的相关研究出现较早，从土耳其共产党创立开始就有学者对此进行关注。国外研究有几个分析角度：理论范式的角度、土耳其本土学者和欧美学者的角度、以及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角度。较早的经典研究包括乔治·哈里斯《土耳其共产主义的起源》、雅克布·兰道《现代土耳其的极端政治》、伊戈尔·李珀夫斯基《土耳其的社会主义运动，1960-1980》等。近期的研究包括梅庭·楚尔汗奥卢的《历史、土耳其、社会主义：遗产的更新》、布雷特·古凯伊《苏联的东方政策和土耳其，1920-1091》。国外的研究历史较长，有专门领域的学者、相关研究数量众多、一手文献和资料使用普遍；但同时也有鱼龙混杂，难以筛选的情况出现；学者自身立场对文献的适用和结论的导出也有影响。

未来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基于一手资料的政党和政治制度研究、政治暴力；社会主义与少数族裔；社会主义与女性；工会联盟；冷战框架下的新审视和新思考；恐怖主义等。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亚克的报告题为《21世纪以来土耳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研究》。

自1923年建国以来，土耳其在内政外交中全面推行“西化”政策，教育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着日益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方向发展。2001年土耳其加入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博洛尼亚进程以来，为塑造“欧亚大陆中心和枢纽”的大

国地位、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弘扬土耳其文化，扩大学术影响力，土耳其政府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2014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把质量保障、发展学术人力资源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确定为三大战略，2017年出台了《2018-2022年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2020年发布《以目标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包括扩大学生与学术人员的双向流动、增加国际化项目和课程、增加国际学生奖学金名额、推进重点大学建设工程、积极签署高等教育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建立土耳其和阿拉伯高校联盟网络、建设伊斯兰世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推动中东学术遗产保护项目等。经过努力，2017年土耳其的国际学生人数已位居世界第十位，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快速推进模式中最有代表性的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上升，年均增量达6.77个百分点。

土耳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呈现出以下特点：有明显的优先发展方向；战略实施主体由“政府主导型”逐步转变为“政府——院校协作型”；更加注重教育输出和输入的双向度发展；加强难民对土耳其高等教育的融入。

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辛思思发言题为《土耳其内政外交中的宗教事务委员会》。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已积累了一些有关宗教事务委员会的研究成果。国内学术界有周国黎的《土耳其宗教事务管理局》、刘义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土耳其的宗教风险研究》就土耳其内政中的宗教事务委员会做过专门研究。辛思思和刘义的《土耳其对外关系中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杜东辉

的《土耳其外交中的宗教行动者：宗教事务委员会》考察了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对外活动。

国外学术界有关宗教事务委员会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土耳其多位学者考察过宗教事务委员会，且角度多样，如卡亚的《社会学视角下的土耳其宗教与国家关系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塔什的《土耳其人眼中的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戈扎伊登的《宗教事务委员会：土耳其共和国的宗教管理》。国外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侧重考察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对外活动。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布鲁斯的专著《海外伊斯兰教管理：西欧的土耳其和摩洛哥穆斯林》、托尔的博士论文《伊斯兰教在德国和荷兰土耳其移民中的兴起》、科尔库特的《冷战后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欧亚大陆的活动》、戈扎伊登的《土耳其的宗教管理：宗教事务委员会及其以外》、厄兹图尔克的《通过巴尔干半岛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网络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提供一个框架》、《宗教事务委员会作为土耳其外交政策工具：来自荷兰和保加利亚的证据》等等。

辛思思认为，尚未有人对土耳其内政外交中的宗教事务委员会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且对土耳其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挖掘不足。因此，未来可以使用历史学、宗教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个案分析，来深入剖析宗教事务委员会在土耳其内政外交中的影响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丁雨婷关注土耳其女性主义问题，报告题为《土耳其女性史不同叙事范式下的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女性史的叙事相继出现了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等范式。这些叙事范式的思想渊源皆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年代。女性解放是凯末尔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土耳其女性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在土耳其女性史的不同叙事范式中，却对凯末尔主义的女性解放运动有着迥然相异的评价。女性史叙事范式的演变及其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不同评价，本质上是土耳其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它们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义与父权制、国家主义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呈现出土耳其激进的西方化和世俗化改革与深厚的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张力。

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蔡雨玗以“奥斯曼的国族鉴”为题，介绍土耳其历史学家法蒂玛·阿丽叶女士的《奥斯曼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从科索沃大捷到安卡拉惨败》一书。

19世纪中期，受西方史学影响和坦齐麦特（Tanzimat）的推动，奥斯曼帝国开始了有组织的重新编史工作，奥斯曼人由此对帝国此前历史有了新的解读。如果说苏莱曼大帝及其之前的苏丹们代表着帝国的荣光，是加齐英雄的化身，那么，被帖木儿打败、面临初生的奥斯曼国家险些分崩离析的巴耶济德一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忧外患的帝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法蒂玛·阿丽叶女士（Fatma Aliye Hanım, Tanzimat）是奥斯曼晚期改革重臣之一 Cevdet Paşa 的女儿，也是奥斯曼帝国近代第一位女性史家和女性主义者。她在1910年代初所作《奥斯曼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从科索沃大捷到安卡拉惨败》

(*Tarih-i Osmaninin Bir Devre-i Mühimmesi: Kosova Zaferi-Ankara Hezimet-i*), 结合 16 世纪末以来的史学传统和 19 世纪以来奥斯曼国内的政治思想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 探究奥斯曼国家给五百余年后的臣民留下的历史遗产。

本书可见 16 世纪末以来发展出的奥斯曼帝王鉴体裁、“新奥斯曼人”和西方新史学对法蒂玛·阿丽叶女士的叠加影响。法蒂玛·阿丽叶女士也继承了有关君主和秩序的奥斯曼传统社会政治观, 参与了如剪除旁系、君主与陪侍有关君主权威的确立等奥斯曼和欧洲史家长期争鸣的帝国历史重点问题讨论, 并将自由、立宪等新的政治理念与古老史事结合, 讽喻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法蒂玛·阿丽叶女士此作并非单纯的战争考据, 而是面对当下巴尔干战争失败的“国族鉴”(mirror for the nation), 同时也在 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背景下, 维护了奥斯曼的君主制度。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艺涵以《何处是吾乡: 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家园叙事与文化身份》为题, 探讨当代土耳其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土耳其共和国时期, 奥斯曼帝国时基于宗教的身份认同已经不复存在, 共和国早期的精英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认同。奥斯曼时代之前、尤其是伊斯兰时代以前的古代历史, 成为土耳其人建构自己新身份的一个重要来源。基于土耳其共和国的疆域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地区, 因而如何书写安纳托利亚的古代文明, 使其既能与土耳其民族又能与“西方”相联系, 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叙事的核心。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 在对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土

土耳其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出现了名为“安纳托利亚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将中亚视作土耳其民族的起源，而将土耳其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定位于安纳托利亚地区，并在后世发展出了不同的分支。在共和国早期凯末尔主义的官方叙事中，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切古代文明都是来自中亚的“土耳其人”所创造的。这一叙事受到之前安纳托利亚主义的强烈影响，将土耳其人的家园定位为中亚，而安纳托利亚则是土耳其人的“第二故乡”。与之前安纳托利亚主义存在明显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土耳其官方对于安纳托利亚文明的描述主要聚焦于前伊斯兰时代，尤其是以赫梯为代表的古代文明。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土耳其出现了强调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的土耳其人文主义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叙事中，将焦点放在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希腊罗马的文明成果上。到了五十年代，一部分人文主义者进一步发展这一叙事，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尤其是在爱琴海沿岸的文明全都纳入到土耳其人的古代文明当中。在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叙事中，安纳托利亚从古至今存在着一个“文明连续体”。这是一个基于共同地理空间的跨时代文化群体，所有这些文明被想象成拥有“安纳托利亚性”的共同身份，目前的土耳其国家和民族，被建构为安纳托利亚文化连续体的最新一环，这是一种典型的领土民族主义思想。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肖京发言主题为《克服东方主义：论休谟政治视野中的土耳其》。

在阐明自身政治形态之历史意义的时候，十八世纪西欧

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作者，往往会参照虽然遥远但又有着密切联系的土耳其。当代研究指出，这种做法，要么有意无意地预设了东方相对于西方的从属地位（如萨义德《东方学》），要么是把自身的某种狂想和隐秘追求投射到了东方（如Alain Grosrichard, *Sultan's Court: European Fantasies of Asiatic Despotism*）。但这些研究忽视了，在十八世纪西欧的主流政治思想中，仍然存在一种致力于客观地把东方政治经验纳入西方政治视野的努力。

休谟克服了马基雅维利对东西方政治社会形态差异的理解，又克服了孟德斯鸠东方专制论的意识形态和想象色彩，从而实现了用同一个政体分析范畴来阐明英格兰、法兰西和土耳其的不同政治经验。休谟的政体范畴把君主、共和与专制的三分转化为君主与共和的二分，为土耳其找到了一个类似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位置，强调在十八世纪现代国家形成以前，这三个国家的君主制都是半习俗-半强制的合作型权威，其统治固然带有人身性的恣意色彩，却并非孟德斯鸠想象中的可怖专制权力；现代国家的各项非人身性的制度安排，可以从君主国的传统权威形态生成出来。

总之，尽管休谟对土耳其的兴趣仍然在于阐明西方现代政治的独特形态，他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异文明的政治经验客观地纳入自身文明政治视野的方案。在克服对异文明的系统性政治扭曲和历史狂想的同时，他也为寻求对自身文明政治经验的客观理解扫清了道路，为一种克服了东方主义的政治科学和历史书写提供了概念工具和组织框架。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卢宇嘉、阿迪、秦彦洋，硕士研究

生茹诗瑶等列席会议并参加讨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董雨在总结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中土建交 50 周年，在北京大学举办全国首个土耳其研究领域博士生论坛，可谓适逢其时、别具意义。为期一整天的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博士生踊跃发言，既反映出国内外土耳其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也彰显了我国土耳其研究“后浪”的蓬勃生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希望以此次学术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增进土耳其研究博士生的交流互鉴。